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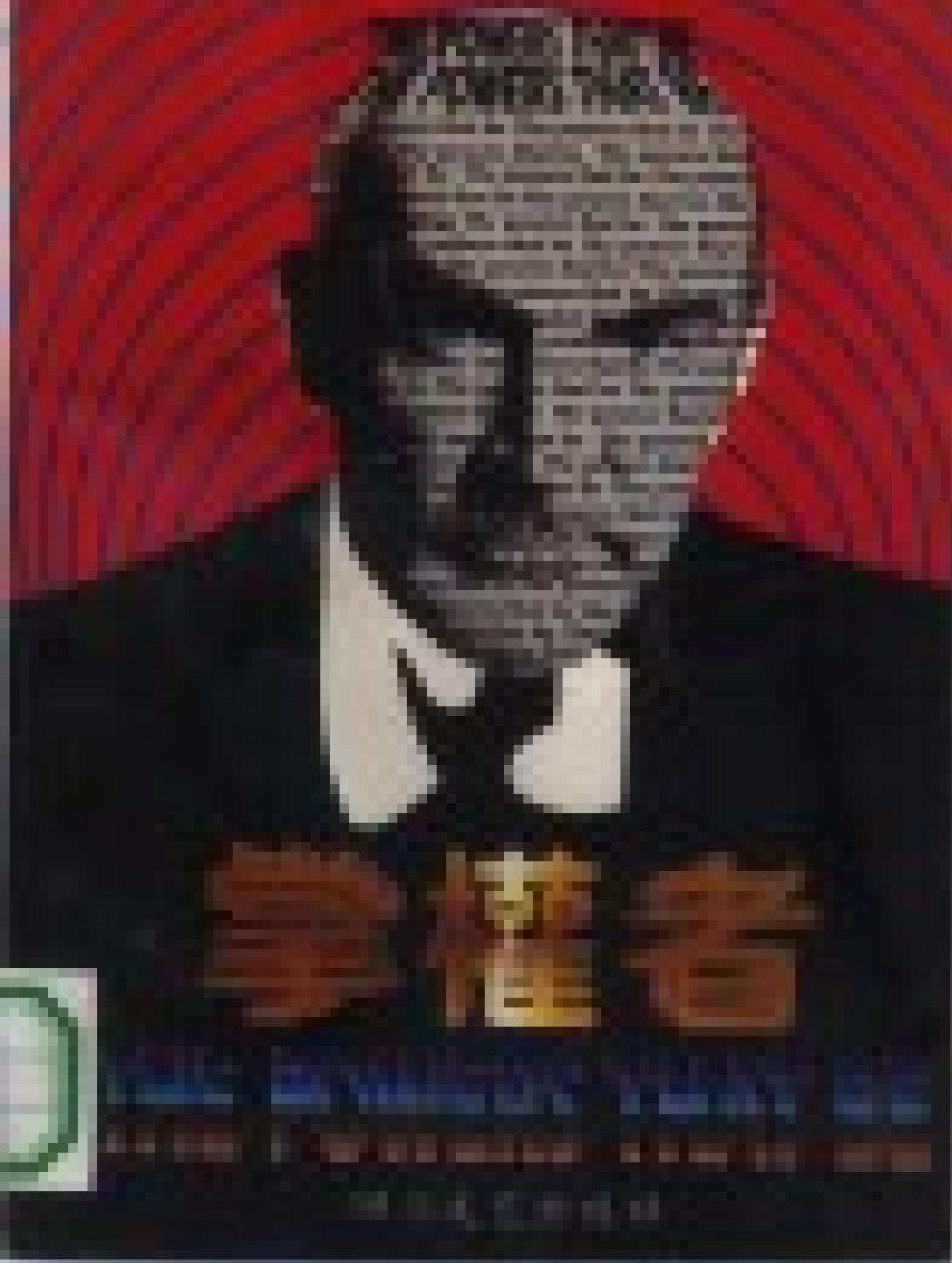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tah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ah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
b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
Th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be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powers that be The
powers that
powers

掌權者

THE POWERS THAT BE

四川文艺出版社

【圖】中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6041/57
12

掌 权 者

(下)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4年8月 · 成都 ·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张 伟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掌 权 者

译者 尹向泽 沙铭瑶等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成都美术印刷厂

1988 年 3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625 插页 8

印数 10500—15,500 字数 852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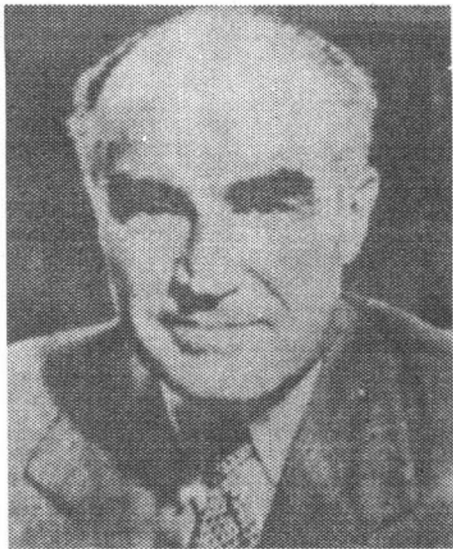
ISBN7—5411—0171—0/I·165

定价:26.60 元(全套两册)

亨利·R·卢斯

(1898.4.3~1967.2.28)

美国杂志发行人。创建发行《时代》、《幸福》和《生活》杂志的出版王国，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1929~1964年卢斯任时代公司所有出版物的总编辑，《时代》周刊用叙事体报道消息，十分重视国际事件，这家新闻杂志将各类文章登在专门栏目内，并常常建议读者对其报道应如何评价。他的记者和编辑一起写消息，名之曰“集体新闻学”。他出版的杂志经常利用其资料室的调研材料，使消息和报道更臻完备，卢斯出生在中国，早年曾随在中国传教的父亲生活。



这是卢斯和他的夫人克莱尔·布思·卢斯的合照。卢斯夫人是剧作家及美国社交界的名人。两人都性格坚强，善于辞令，政治上保守，对共和党及其政策以及全国政治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威廉·S·佩利

(1901.9.28~)

美国广播事业的先驱者，哥伦比亚广告公司(CBS)董事会第一任董事长及主席，他主张在广播及电视中实行言论自由，而以其技能和远见引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入电视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政府中任地中海战区战时新闻局的主管人，美国战时新闻局心理作战处无线电广播方面的负责人等职。

凯瑟琳·格雷厄姆

(1917.6.16~)

美国最权威的女报人之一。《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和其它报刊的女老板和发行人。她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于1963年自杀后，她继任“华盛顿邮报公司”总经理达10之久，1973年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她领导的《华盛顿邮报》在揭露美国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巴问题的秘密文件，公布五角大楼关于越南问题的内幕，以及通过一系列“调查性报道”揭露“水门事件”大反尼克松，遂使该报声誉鹊起。



奥蒂斯·钱德勒

(1927.11.23~)

钱德勒家族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老板和发行人。奥蒂斯·钱德勒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他于1960年继其父担任《洛杉矶时报》的发行人。



沃尔特·李普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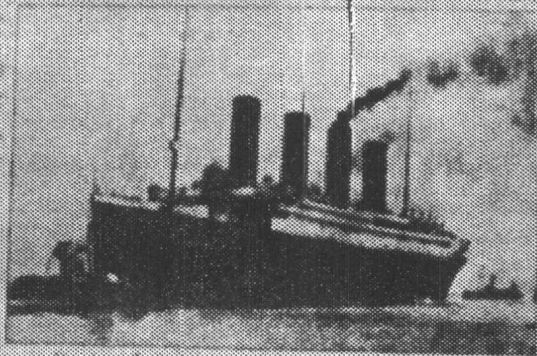
(1889.9.23~1974.12.14)

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60年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1917年曾一度任陆军部长贝克的助手。1919年被威尔逊总统派去参加凡尔赛和约谈判，1929年至1931年任《世界报》主编。1931年在《纽约先驱论报》开辟《今日与明日》专栏；他的专栏评论流行甚广，曾被250多家美国报纸和大约25家外国报纸联合利用。李普曼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他的著作有《政治序论》、《趋势与主宰》、《舆论》等。



The New York Times.

TITANIC SINKS FOUR HOURS AFTER HITTING ICEBERG.
888 RESCUED BY CARPATHIA, PROBABLY 1250 PERISH.
ISMAY SAFE, MRS. ASTOR MAYBE, NOTED NAMES MISSING.



The Lost Titanic, Sinking Toward End of World's Hardest

PARTIAL LIST OF LOST PASSENGERS



1912 年 4 月 16 日，
《纽约时报》报道 20 世纪
的重大新闻之一——泰坦
尼克号巨轮沉没事件。

第三部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一切事物都因电视而加快了步伐。电视简单,也简化一切。它非常戏剧化,触及了全国大批新观众;象《时代》和《每周新闻》这类杂志因为拥有二、三百万美国读者,一度被视为全国性大刊物;而现在的新闻,每晚在同一时间、同一节目中就能传及六百万人之众(用丹尼尔·肖尔的话来说是“全国性晚间集会”)。电视能够有力、有效、有情地报道某类事件,并且真实无误。它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歪曲真象,无视公共政策中难以处理的灰色部分。它可以表现某些非道德的行为(如南方合法的种族隔离),因为这类东西显而易见,简单明了。但是,要它应付远为复杂的北方种族问题就困难多了。因为北方的种族问题既难以戏剧化,也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电视很快对这类问题失去了兴趣。

在文化节拍加速之中，所有的事物、人物都来去匆匆。电视使各种事物迅速膨胀起来，也让他们同样迅速地消失下去。根子不牢，全国很大部分都生活在电子沙漠之上，而不是植根在真实的土壤之中。饱和点与厌烦临界点都提前了，在争论和问题尚未解决、完成和决定之前，人们对问题本身已经厌倦了。电视增强了人们对越战的兴趣，第一次煽起了对战争的热情，可能因此在战争远未结束之前就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进程，将人们置于厌烦状态；当战场上仍然硝烟弥漫之时，战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结束了。电视无记忆可言，它对过去没有兴趣，它抹去过去的历史，没有时间播放过去事件的剪辑，所以它势必加快未来的到来。最重要的是速度和活动。六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报道安息日的制片人佩里·沃尔夫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玛亚·麦克劳克林：“今天你在做什么？”“正在决定是否报道一次示威。如果不报道，这次示威就不会举行。”她回答道。

对于专业人员，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电视是一种背叛。仅仅一部打字机和一名记者，一名记者和一个麦克风再加纽约的一名技师已经不够了，还必须有影片、音响和若干的技工，最重要的是要有制片人。一些不必经过训练新闻工作者，他们可能明白，但也可能不明白某个新闻事件的真正意义。制片人是一种新的品类，训练来发掘和寻找片子中的戏剧性。六十年代权力逐渐从记者手里转移到制片人手中，六十年代末，记者苦涩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制片人主义”，在这个体系中，新闻制片人控制着新闻，政府或某议员的办公室可以不给记者打电话，直接向制片人概略地勾画出某个新闻事件，解释某部片子的可行性，报道的任务分派单由制片人签名，上面还常常加有这样的标记：‘有接受任务的资格和才能’。接受任务的资格和才能。这完全颠倒了传统的新闻程序。传统的程序是记者赶赴采访现场，用眼、用耳发

现重要的东西,发现值得报道的东西,然后告诉本部。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平衡。记者最多只对事件本身作出反应,而制片人则对各种远为复杂的刺激因素——影片、管理、对节目的要求,收看率作出反应。制片人,就连最好的、最正直的制片人也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经营部门,较之记者,他们对新闻节目在特定的时间内能够承受的压力感觉更加敏锐。制片人懂得收看率对以群众为基础的新闻节目的重要性,收看率考虑戏剧化,考虑视觉效果,考虑观众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可以吸收的国际或者复杂的新闻报道的程度,以及其它广播公司以影片形式加以利用的可能性影片。影片是最重要的。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对新闻的不同的判断标准:戏剧化的东西,中看的東西,人們愿意看的东西,以及人们可以接受的令人不快的坏消息的程度。供二千万人看的视觉新闻的组成原则与支配编辑供一百万左右上流读者看的,诸如《纽约时报》等上流报纸的原则完全不同。

权力和可行性的变化始于1962年出现的半小时新闻节目。1960年政治家对电视的看法与1964年的看法有着天壤之别。1960年,电视深刻地影响了竞选和亮相的方式;到了1964年,电视已成了竞选本身,过去十五分钟的节目多少只能算无线电广播的衍生物,阵势小,还缺乏力量。可能实际只有十一、二分钟的广播时间。技术知识、技术手段和胶片都比较原始。不少画面只是说话的人头。随后突然间起了变化:二十二分钟的时间,转速越来越快的新型胶片、小型摄像机。不久又出现了卫星转播站。突然间,新闻节目开始需要大量的采访人员,需要建立新的办事处,播放时间需要内容,影片需要拍摄。六十年代初,在广播公司行政人员决定是否采用半小时新闻节目的关键性会议上,严重的问题是能否有足够的影片和新闻。须臾之间,采访记者变

得重要起来。代替四十五秒种的可能是二分钟。一夜之间,记者获得了这个国家的最强大的政治讲坛。政治家总是到人们集聚的地方去,而1963年人们每晚都聚集在自己的娱乐室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不论对政治家还是对公众都不起眼,因为1964年的大选掩盖了变化。那是一场力量悬殊、局面明朗的选举。很明显,约翰逊将生吞戈德华特。然而,对1964年,进行采访的报刊记者来说,整个安排的变化是非常清楚的,现在竞选已非昔日的竞选,再也不是争着占有东海岸大报的主要版面,而是争抢晚间的新闻节目,最重要的是摄片。必须适应电视镜头。1960年最有技巧的竞选人的新闻助理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得到詹姆斯·赖斯顿的正面评论专稿,以及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而现在,电视是第一位的,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有好片子在晚间新闻播放。西奥多·怀特是一位怀着特殊兴趣观察这个过程的人,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变化就象从手工操作的单页印刷机进入了滚筒印刷机一样。

早在五十年代中叶,西格·米切尔森和其他一些新闻行政人员就希望有人替换杜格·爱德华兹充任晚间新闻的节目主持人。爱德华兹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一位节目主持人,他在电视初创时期得到这个职位。他很漂亮地抵挡住了全国广播公司约翰·卡梅伦·兹瓦茨的“骆驼新闻大蓬车”节目,但是亨特利-布林克利的崛起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爱德华兹没能播出米切尔森和其他人所希望的有分量的东西。他的个性不是那样踏实有力,不足以稳定一个新的现代新闻节目。道格拉斯·爱德华兹结束晚间新闻时常说,情况就是如此。但是人们并不一定就相信情况就是如此。开始米切尔森试图用查尔斯·科林伍德换下爱德华兹(他很清楚对他的压力)。其原因有二,一是科林伍德是默罗小组的成员,他十分灵活巧妙地将收音机过渡到了电视,他有才

华、有魅力，是文采优美的作家，看来他是默罗的传人，也是默罗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二是行政人员对他的看法甚好，再说，他还是帕利的私人朋友，战时，他和主席一呆在伦敦。但是，当时赞助人很有力量；一个赞助人就能掌握整个节目，帕尔·马尔的人对撤换道格拉斯·爱德华兹，任用查尔斯·科林伍德完全不感兴趣。帕尔·马尔喜欢道格拉斯·爱德华兹。

随着新闻节目重要性的增加和全国广播公司收看率的上升，要求新的节目主持人的压力增大了。人选对国际国内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要播放的新闻节目的类型。在播音行业的雄心勃勃、形象高大的明星群中，争夺这个职位的竞争很激烈；重要播音员从未受过缺乏自我指责，他们想成为具有决定权的人的愿望十分强烈。在潜在的新主持人中，霍华德·史密斯和埃里克·塞瓦赖德早在五十年代就遇上了同样的表现自己才华和风格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是超级明星，他们不仅是记者，还是评论家，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评论很精彩，尤其当评论来自国外时更是如此，但是，他们回国之后，负压力增大了。塞瓦赖德对杜勒斯经常性的批评激怒了高级官员，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国外，不存在大的麻烦。但是史密斯却一直处在麻烦之中，回到华盛顿后，他的稿件上出现了很多的删改，麻烦比塞瓦赖德大得多。朋友们认为，部分原因是风格的不同。塞瓦赖德是个更为细腻的作者，更富于技巧，他学会了在表达激烈的观点时不显出激烈的痕迹，而史密斯则是一个强硬的作者，他运用尖锐、直率、肯定的句子，非常直截了当，人们从来不会误会他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

塞瓦赖德和史密斯都越来越受挫于对他们增加的压力，而希望见到帕利，而帕利却不急于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日益紧缩的控制就意味着承认了控制的存在。讨论今天的和昨天的不同也

就承认了确有不同之处。塞瓦赖德对美国外交政策中日益增长的好战精神和对亚洲缺乏精细的辨别力而不安,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这样强大的组织没有能力指出这一特征,没有能力展示真正的外交政策辩论的可能性而忧虑。最后总算安排了塞瓦赖德和帕利之间的会面,但是会面不成功。帕利(现在他的朋友在白宫,他以政治上、社会上的密友为转移,将火力对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每一点冒险的新闻思想)把距离拉得很开。塞瓦赖德提出了问题,谈到现在的报道和任何评论都困难重重,大量的编辑和删改,帕利对此置若罔闻;这是公正法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必须公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能超越队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能享有保持观点的奢侈。塞瓦赖德争辩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从来就是第一流的,战争期间它显示出了领导的英姿,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必须显示出领导的身份,必须帮助廓清一次急需的公开辩论。抹煞公众关注的重要焦点的情况太多了。如果说新闻人员有专门的知识——这一点在公司内部意见也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应该将知识传递给听众;这些东西比政府目前讲的要多得多。但是,帕利寸步不让。他对领导地位不感兴趣,尤其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他可能对商业广告的领导地位感兴趣)。一无所获,他带回来的是现成的回答,什么公正啦,信任啦,还有政府的批准等等。关于职业性和情报的限制,以及记者是否应该根据其他人对客观性的定义,表现出他本人更无知的样子等,已是年代久远的争论了。西格·米切尔森会见时在坐,他感觉到帕利决意不理睬塞瓦赖德所说的任何一个字,所有的决定早作出了。

霍华德·史密斯是同一问题的牺牲品。他在国外呆了二十多年,于五十年代末回国,报道美国事务。他是一位有才智,又深沉的记者,一个很复杂的人,即便在冷战最盛的时期,他也没有

同意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看法；相反，他看到了东欧民族主义的渐变，这不是流行的观点，因此，他常常受到攻击，攻击他过于左倾。在伦敦时他就习惯了对他每周新闻评论程度不等的编辑和删改。现在，回到美国，他发现情况更是不同。每当他惹恼了某个重要政治家，这位人物就会给他上司打电话。他发现了新闻界的一个症结，《纽约时报》一位著名记者托尼·卢卡斯将此称作阿富汗原则。卢卡斯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世界不发达地区呆了六年之久，他很快明白作为一名《时报》驻国外记者，你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直率、尖刻、敏感地对待当地政府，来自本部的影响惊人的少。你越靠近华盛顿或纽约的权力中心，你能够说的东西就越少。如果你用叙述印度总理的那份自由来描述纽约的供水监督，那你的评论说不定就不能付印。显而易见，阿富汗原则的基础是：真象在远方才能舒适地存在。

从欧洲回来后，霍华德·史密斯发现自己处于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使他的评论变得越来越温和，高级行政人员阶层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愤懑；他似乎是最得罪政府，得罪帕利的保守派朋友的人。1961年初，默罗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肯尼迪工作时，他正在准备一部有关伯明翰种族政策的“CBS 报道”的新闻片。史密斯被派去接替这项工作。片子有一段演的是，在暴徒殴打支持公民权的工人时，伯明翰的警察袖手旁观的情景。史密斯本人是南方人，看到这里，他也震惊了；他曾目睹纳粹和法西斯的兴起，现在，他回到美国，看到了同样的征兆。在解说中他引用了埃德蒙·伯克的话，“邪恶获胜的唯一必要手段就是使好人无法有所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高级官员已经敏感到南方机构的怨恨情绪，他们想把此话去掉。（在和史密斯的争论中，弗兰德利说了很重要的话，他说，对于电视片来说，用不着如此暴露性的评论，影片本身就有强的破坏性，它本身就说出了一切。）史密